

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罗银芳

2023年9月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四名大四女生组成“新闻跨土木”小组，随后确定了她们毕业设计的报道选题：了解工地上的女性。对于小组成员来说，这是个陌生的群体。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但双方从无交集。

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，要讲怎样的故事，一切都是未知。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，小组成员们辗转深圳两处工地，与23名工地女工取得联系，甚至争取到机会进入工地与女工们同吃同住三天。

2024年4月中旬起，该小组推出系列报道《她立于瓦砾之中：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纪实》，以两篇报道和一部微纪录片讲述深圳工地女工的故事。通过学生的眼睛，从她们的观察和记录中，去关注一个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。



武子婷与工地女工边吃饭边聊天

# 漫读周末

## 记录立于瓦砾中的她们

### 大四女生住进工地宿舍

#### 以两篇报道和一部微纪录片讲述深圳工地女工的故事



在妇女节当天，武子婷将鲜花递给了女工杨承兰



工地女工李七双正在检查挂钩



(左起)武子婷、陈书婉、贺思雨、曾菲彤在毕业设计答辩现场

### 3 同吃住三天

在征得同意后，3月9日起，小组成员被允许进入工地，获得与女工们同吃住三天的机会。

第一天，每个人的第一感受都是：起得很早。5时30分，深圳的天还没全亮，工地里的灯零星亮着，杨承兰的早餐是一碗泡面。时间尚早，但她已经是宿舍里最后一个人了，其他女工早已赶去上工。上工前，杨承兰从床头掏出一个本子，写上今天的日期，以此来记录加班时长。电梯驾驶员每个月的基础工资是5000元，加班一小时20元，杨承兰凭借这个本子来核对自己每月的薪水。

杨承兰一天的工作，都在工地的电梯间里——她们称之为“梯笼”的地方。她需要驾驶电梯对物料和人员进行垂直运输，因为工地电梯没有具体的楼层按键或是确定的停止点，杨承兰需要不时通过前方和左方的小窗判断高度和位置，仅凭目测停下电梯。为了这份工作，她特地去了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。过去一年，有340多天，杨承兰都待在“梯笼”里。

8时30分许，在工地内部，39岁的塔吊指挥员李七双正配合着塔吊司机将地面材料吊至高处。吊臂垂直吊着上百斤的钢管缓缓升至高空，从头顶平移过去，投

下的阴影让即使戴着安全帽的学生们也感到有些心慌。这是李七双离开云南老家外出打工的第13年，也是第二回站在了深圳的土地上。

这处工地有工人超千名，女工仅有二十多个，在男性主导的工地里，女多男少的工种尤为罕见，曾菲彤留意到，杨承兰和李七双的岗位基本由女性担任。“包工头说，像这种经常需要跟人沟通交流的工作，有时候相比起急吼吼的男工，女工有着更为细腻、稳定的情绪，在工地里做协调工作效率更高。”曾菲彤提到。

但冲突也时有发生。工期赶、工作忙的时候，摩擦不可避免，当对方不讲道理时，女工们也会反唇相讥。杨承兰自觉“开电梯总是会受点委屈的”，工地一整栋建筑只有两座电梯，有时会忙得难以及时回应，尽管杨承兰已经一刻不停地操纵着电梯上上下下，但依旧会受到一些工人的责骂，她们有时会大声地吼回去。

一天的工作流程来回反复，直到晚上10时许，才有女工陆续下班。武子婷回忆道：“来之前我设想会有很多温馨的画面：跟女工们一起聊天玩耍，半夜吃个宵夜唱个歌什么的，但其实她们压根没有自己的时间。”



工地宿舍内部

现在的生活。”武子婷说道，“她们努力活得精彩，那种质朴而又坚韧的力量，一次次打动我们。”

四名女生最终将她们的报道命名为《她立于瓦砾之中》。“她”既是在建筑工地——这个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，一次次克服艰难、努力工作的女工，也是在细碎日常里，总是笑着面对、尽力生活的女工。

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0级新闻系毕业设计答辩在4月26日进行，四名女生邀请了其中几名女工参加，“她们都非常希望能到大学里走一走、看一看”。然而，答辩当天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她们还是没能到达现场。

《她立于瓦砾之中》的展示获得不少好评。这一天结束后，这组报道中涉及的女工继续在工地里埋头苦干，采访这组报道的四名女生，也已有了各自的毕业去向，或深造或就业。短暂交集过后，不同的道路在脚下展开，但不论是工人还是学生，都得到了一些新的体验和感悟，都希望彼此在瓦砾中也好，在康庄大道上也好，都能以一直“立”着的姿态，勤恳生活下去。

(文中部分内容引自系列报道《她立于瓦砾之中：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纪实》，其中安颖、曾立新为化名)

### 1 蹲点小吃摊

下午5时许，占据深圳湾文化广场一隅的小吃摊逐渐热闹起来，附近工地开始下班，大批工人蜂拥而至。工服虽脏，不妨碍大快朵颐，食物散发的香气与辛劳过后的汗水搅合在一起。一开始，陈书婉面对这样的场景会感到局促：“九成以上都是男工，我们几个年轻女生站在那，显得格格不入，不敢跟别人开口。”

2023年9月起，确定毕业设计选题后，只要没有学习或实习任务，几乎每个周末陈书婉和其他三名小组成员都会前往深圳湾文化广场，由于进不去工地，她们寄希望于在这里的小吃摊上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。“在男性主导的工地，女工毕竟是少数，可能七八个人里只有一两个，并不容易碰上。”陈书婉回忆道，不同于男工们喜欢三两两吃着喝着聚在摊位吃饭，女工更喜欢打包拎走，这给“守株待兔”

的她们造成一定的困难，“我就在摊档上买点东西，看到有女工过来，就赶紧凑过去套近乎。”蹲坐在马路牙子上，陈书婉手捧着饭盒，“姐，你也来这里吃饭呀”，成为她常用的开场白，然而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

开篇前没想到的情况不断发生——比如小组派发的寻人传单石沉大海，比如很难在人来人往的小吃摊上再次碰上同一位女工，比如好不容易要到联系方式，第二天对方又销声匿迹……信任，总是人与人之间最难解决的问题。“跟这些女工聊天时，她们大多数很热情，问什么答什么，也有人聊着聊着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。但经常第二天再问时，她们就会说不想掺和这事情。每每给你希望，又一次次扑灭，反反复复持续半年时间，我们都很沮丧。”

开篇前对女工群体的印象也

在逐渐改变。起初，小组成员曾菲彤很难想象会有女性去工地干重体力活，在她的理解中，做家务当保姆或是去流水线上打工会更轻松、更适合女性身份一些。“但跟越来越多的女工聊天后会发现，在工地工资高一点，而且她们觉得去工厂没有自由，甚至上个厕所都要打报告，所以主动逃离流水线。”这打破了曾菲彤原有的认知。

女工安颖给小组成员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安颖今年刚满30岁，在工地女工里属于少有的年轻人。跟大多数联系上的女工一样，安颖十分热情地接受了学生们的请求，双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联系。“春节期间她回家了，后来我给她发消息，明显感觉她变得冷淡，后来给她打电话，被她全部挂断，也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。”陈书婉说道。

个消息在短時間內傳遍幾間女工宿舍，一朵康乃馨在傳遞，被或雀躍大方或羞怯沉默地接過，顯然鮮花是不常出現於此的事物。

这天晚上，也是武子婷第一次见到49岁的电梯驾驶员杨承兰。“当时只有我留在电梯间跟她说话，她看着我，可能想起她的女儿了，笑得真真切切。”武子婷说道，“我把花递给她后，她又问我要了一朵，说要带给同在工地上的妹妹。”距离感在这个请求中消失了，经历过之前半年无数次拉扯与拒绝，对选题有些灰心的武子婷一下子被点燃，女工群体不再只是一个符号，“之前不管怎么努力，都没办法走近她们。那天杨姐只是多要了一枝花，但那个瞬间觉得距离一下被拉近了。”

工地宿舍条件有限，地方狭窄，杂物颇多，灯光也昏暗，但四名女生不约而同地记得，在简陋的房间里，堆满东西的桌子被清出一角，女工们用矿泉水瓶充当花瓶，珍重地插上她们送来的康乃馨。

### 2 「三八」妇女节

在贺思雨的描述中，她们小组的毕业设计定题很快，在四十多个备选题目里，两位指导老师都对这个问题青睐有加。在沟通中，指导老师陈显玲曾向她们解释，希望这个选题能够让她们“关注女性的境遇，认识真实的社会，接触常被忽视的群体，得到一些触动”。

选题定得很快，但推进缓慢。在深圳湾文化广场建设工地附近，小组成员努力近半年时间，尝试与多位女工沟通，但一直没能取得对方持续信任，“她们很怕被骗，即使我们一再解释、证明自己的身份”。

2024年3月，在几近放弃之际，转机出现了——有成员几经辗转联系上深圳龙岗区某工地的包工头，这回，她们被允许进入到工地里。

灰绿色的帆布包裹着未成型的建筑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空间被钢筋和铁板分割成一格一格，工人们在其中爬上爬下。贺思雨跟在包工头身后，一条水渠笔直地将工

作区和宿舍区串联起来，终点隐于远处高楼大厦的边缘不可见。她走进临时搭建起来的铁皮房宿舍，每走一步都发出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。

宿舍楼高七米，两层，一千多名工人住在这里，空间得到了最大化利用，二楼的过道格外狭窄，只能容一人通过。3月8日22时许，四名女学生们走在这条过道上，抬头见上方挂着的密密麻麻的衣服，垂下来的裤脚带着湿气擦过她们的肩膀，迎着来来往往打量的目光，走进了女工们的宿舍。

这天是“三八”妇女节，第一次见这里的女工，武子婷想正好趁着节日，送她们几枝花拉近彼此的距离：“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，送她们一枝花，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”她们进入宿舍时，大多数女工已经准备休息了，看到乍然出现的鲜花，坐在木板凳上的一位女工直接站了起来，接过花愣愣端详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露出笑容。“有大学生来给我们送花！”这

2024年6月  
〈甲辰年五月初三〉

8

星期六

理论评论部主编  
责编 傅铭途  
美编 丘淑斐  
校对 朱文婷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  
请扫码加群爆料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